

李白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李白诗歌英译历史

高虹 詹晓娟
主 编

副主编

巴蜀书社



李白诗歌英译历史

詹晓娟
高虹

主编
副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诗歌英译历史 / 詹晓娟主编.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7. 7

ISBN 978-7-5531-0780-6

I. ①李… II. ①詹… III. ①李白(701—762)—唐诗—英语—文学翻译—语言学史 IV. ①H315.9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4737 号

LIBAI SHIGE YINGYI LISHI

李白诗歌英译历史

詹晓娟 主 编

高 虹 副主编

责任编辑	陈 礼
封面设计	冀帅吉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cn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9.25
字 数	28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780-6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李白诗歌英译历史》编写说明

1. 本书稿的内容旨在对李白诗歌英译历史线索的梳理,从大量散乱的资料中进行筛选、勘误、比对,尽可能勾画出李白诗歌英译历史线索的全貌。

2. 我们通过 CNKI (知网)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外文数据库 (A-Z), 以及四川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渠道, 尽可能收集国内与李白诗歌英译相关的资料 (期刊论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报刊、图书), 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甄别的基础上, 完成对李白诗歌英译历史的梳理, 以及对名家译作的整理比录, 以给其他关注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者提供研究基础。

3. 对李白诗歌英译的翻译技巧和成败得失, 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4. 目前国内关于李白诗歌英译的资料并不完善, 除国家图书馆保存有部分原始资料外, 国内其他图书馆所存非常有限 (这些资料我们都已经复印保存)。与海外汉学研究相联系, 不少资料散存于一些欧美国家, 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 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及国家图书馆等。这些纸质资料很难查阅, 与李白相关的内容, 大多只是中国整个诗歌或唐诗中的一部分, 我们无从知晓这些内容所在页码, 所以难以获得, 这也造成了本书所研究内容的

不完整。

5. “名家译介作品比录”部分只选取了翻译频率较高的作品。目前完整翻译李白诗歌的译者，国内是许渊冲先生，海外译者是日籍翻译家小畑薰良，他们的译作只是部分收录其中。

目 录

《李白诗歌英译历史》编写说明	(1)
第一章 李白诗歌英译历史概述	(1)
第一节 李白诗歌英译的历史背景	(1)
第二节 李白诗歌英语译介历史研究述要	(12)
一、专题研究成果	(13)
二、相关研究成果	(16)
第三节 李白诗歌的早期英译	(19)
一、译介历程	(21)
二、早期翻译的特点	(29)
第四节 李白诗歌的中期英译	(33)
一、译介历程	(34)
二、中期翻译的特点	(45)
第五节 李白诗歌的后期及当代英译	(45)
一、译介历程	(46)
二、后期翻译的特点	(50)
第二章 国外主要译者	(52)
第一节 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	(52)

一、译者生平及著述	(52)
二、《汉文诗解》与李白诗歌翻译	(55)
第二节 赫伯特·翟理斯	(61)
一、译者生平及著述	(62)
二、唐诗及李白诗歌翻译	(64)
第三节 艾米·洛威尔	(70)
一、译者生平及著述	(70)
二、主要译著与李白诗歌翻译	(73)
第四节 威廉姆·强·班布瑞吉·弗莱彻	(80)
一、译者生平及著述	(81)
二、唐诗及李白诗歌翻译	(83)
第五节 哈罗德·威特·宾纳	(90)
一、译者生平及著述	(90)
二、唐诗及李白诗歌的翻译	(92)
第六节 埃兹拉·庞德	(97)
一、译者生平及著述	(97)
二、主要译著与李白诗歌翻译	(102)
第七节 小畑薰良	(108)
一、译者生平及著述	(108)
二、《李白诗集》及其李白诗译介	(113)
第八节 阿瑟·韦利	(119)
一、译者生平及著述	(120)
二、主要译著与李白诗歌翻译	(123)
第九节 斯蒂芬·欧文	(130)
一、译者生平及著述	(131)
二、主要译著与李白诗歌翻译	(134)

第三章 国内主要译者	(141)
第一节 国内的早期译者	(141)
一、蔡廷干	(141)
二、林语堂	(145)
第二节 翁显良	(150)
一、生平简介	(150)
二、李白研究及其古典诗歌翻译	(151)
第三节 许渊冲	(162)
一、译者生平及著述	(162)
二、翻译成就	(164)
第四章 名家译介作品选比录	(169)
一、长干行	(169)
二、长相思	(182)
三、春日醉起言志	(190)
四、春思	(194)
五、春夜洛城闻笛	(197)
六、登金陵凤凰台	(198)
七、独坐敬亭山	(201)
八、峨眉山月歌	(203)
九、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204)
十、关山月	(207)
十一、将进酒	(210)
十二、金陵酒肆留别	(215)
十三、静夜思	(218)
十四、客中行	(229)
十五、梦游天姥吟留别	(229)

十六、清平调·····	(234)
十七、山中问答·····	(237)
十八、送友人·····	(240)
十九、苏台览古·····	(244)
二十、望庐山瀑布·····	(245)
二十一、行路难·····	(245)
二十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248)
二十三、玉阶怨·····	(249)
二十四、怨情·····	(251)
二十五、月下独酌·····	(253)
二十六、早发白帝城·····	(264)
二十七、赠汪伦·····	(265)
二十八、自遣·····	(267)
二十九、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268)
三十、陌上赠美人·····	(276)
三十一、乌夜啼·····	(277)
三十二、姑孰十咏·丹阳湖·····	(279)
三十三、秋风词·····	(280)
参考文献·····	(281)
后记·····	(288)

第一章 李白诗歌英译历史概述

第一节 李白诗歌英译的历史背景

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拓展未知领域的本能行为。自古以来中国在努力认识域外的同时，其他民族也在关注着中国，由此衍生出了绵延不绝、蔚为壮观的中外文化交流成果。

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而言，早在公元前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著作中就已经有对中国的记载。但真正来到中国，亲眼目睹中国状况却是一千多年之后了。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要算 13 世纪的马可·波罗，但他仅仅是来到了中国，而对“汉族两千多年的传统教化，他是知道得不多的。”^①他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只是沿途的见闻，还谈不上对中国有什么研究，更没有深入到中国文学的

^① 柳存仁：《从利马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转引自林徐典：《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文学语言卷），中华书局 1995 年，第 6 页。

领域之中。但中国文化的繁荣璀璨，却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就当时情况而言，中国无疑是让来自西方的马可·波罗艳羡不已的。他的游记在他的故乡传开后，也引起了他的同胞对这个远在东方的神秘国度无尽的向往。

15 世纪新航路开辟后，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已不像以往陆路那样困难，殖民者加大了东进的步伐，西方开始了对中国的探索和研究。但明初却实行海禁政策，使殖民者一直未能踏上中国土地，所以整个 15 世纪，情况仍然是“欧人关于中国之记载，非旅行之见闻，即事业之报告，距研究之域尚远”^①。

16 世纪西方开始全球的扩张运动，基督教也参与其中，并通常是这一运动的急先锋。在中国也是传教士们先于殖民者叩开中华帝国大门。1540 年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Loyola, Ignatius de, 1491-1556）创建耶稣会（Societas Jesu）^②，1549 年派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 1506-1552）东来传教。沙勿略却未能实现此行，壮志未酬，1552 年客死中国沿海的上川岛。1578 年耶稣会又派利玛窦东来传教，利氏成功进入中国。他深刻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想使中国人信基督教，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跟中国人沟通交流，基于此，他在华一呆就是 28 年，在实践中开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教方针，那就是说汉语、读典籍、着儒服、奉华俗的“适应”策略，由此也开启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随着他的成功，其他传教士也陆续进入中国，如曾德昭、卫匡国、柏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1989 年，第 60 页。

② 注：本书中的外文人名、专名之中文译称主要采自黄光域编：《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也有部分译称来源于其他资料中，鉴于比较分散，本书将不再一一注明。

应理等人。

在传教的过程中，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柏应理等人对中国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之以前都有所突破，有人称他们为“近代史上的第一代汉学家”^①。他们的著作和书信集大大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尤其是对中国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出现了中外对照的字典，学者们初步具备了阅读汉语文献的能力，对中国的文化思想、政治制度、民风民俗已开始了研究。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较之以前进一步深入。在开明运动、重农主义、开明专制的政治讨论、百科全书运动中，都曾用中国文化作为材料和观点。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和亚当·斯密认真审视了中国的古老文明。

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史称“礼仪之争”。中外双方都禁止传教士来华传教，致使19世纪初“西方在华传教事业非常糟糕，1810年帝国境内只有31位欧洲教士。在北京的传教中心几乎已经消失，1838年11月2日，葡萄牙传教士毕学源（Pirès-Pereira, Gaetano, 1763-1838）去世后，北京城内已无外国传教士，由利氏所开创的传教中心到此灭亡”^②。

这场争论还造成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除1792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外，西方与中国几乎中断了交往。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沿海才又出现寥寥几位商人和传教士，外人对中国认识再次中断。直到“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尤其是很多商人甚至不

① 李天刚：《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②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180-181.

知道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地”^①。致使 1792 年马戛尔尼使团抵华，撰写了不太客观的中国观，“得出清政府貌似强大，实则腐朽衰弱，在许多方面已落后西方国家的结论”^②。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外隔绝的局面。1842 年《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1844 年美国、法国又分别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据此，英、美、法国等人可以携带家属居住于香港和通商五口。虽然游历内地还有种种限制，但是毕竟获得了亲自目睹中国的机会，为深入调查研究中国提供了基础。

于是这些欧美国家的各色人等，包括他们的家属，远涉重洋，陆续来到中国各地。他们在通商口岸或工作，或访问，或旅行，或寓居，开始了另一种特别的异域生活。中外直接沟通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了，但是中西传统文化不同，生活方式互异，当这两种不同文化相遇时，因彼此缺乏了解、互信以及有效的沟通和适应，必然产生了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现象^③。

西方以宗教为主，中国以人文为主；西方人崇尚科技，中国人敬重祖宗方法，二者之间虽有相同之理，但其融合一致起来却不是短时间的。加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西之间存在较大的隔膜。自古形成的“华夷”观念，加上战争失败带来的屈辱，使得作为“堂堂天朝”的子民不仅难以接受惨败于“区区岛夷”的事实，而且更加反对

① Miscellaneous,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IX., Aug., 1850, P460.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一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第 408 页。

③ 茂海建：《关于广州反入城斗争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6 期，第 55 页。

红毛番鬼出入于街市，中外接触初期不停地出现摩擦与碰撞。清官僚士大夫提出了各种制夷思想：“以夷制夷”、“以商制夷”、“以民制夷”、“以静制夷”等思想相继涌生，彼此交错，相互渗透^①。这种思想导致了政府官员的消极抵抗，通过回避、拖延的方法企图达到以静制夷的目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采取不战、不谈、不和的“三不”政策，“拒不承认外国代表和不对他们作任何让步”^②。闽浙总督刘韵珂不愿英人入城，遂“阴加阻挠，密为牵制，使该夷不能即遂其谋”^③。表现之二是各地出现的“反入城”斗争，根据条约，外人拥有在通商五口的居住权和一定区域内的自由活动权，然而在福州、广州却出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排外倾向——反对外人入城。

在广州，民众散发揭帖，控诉“英夷居心险诈，桀骜鸱张，罪恶擢发难数”；如果任其入城“终将导致夷人之进一步掠夺，最后造成战火复燃，互相残杀，不可遏止”^④。“外国商人只有冒着不断的挑战式的侮辱，才能越出商馆限定范围之外，只有冒着被殴打和可能受伤的危险，才能到甚至极短距离的乡村去”^⑤。商人知道英人入城后，“人情惶恐，客心疑惑，在粤之商，早决归计，远方之客，闻风不来”^⑥。广州入城，前前后后拖延了15年。

在福州，直到1850年仍拒绝外国人入城，“让他们住在城外的破

① 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 Provinces of China*, P107-108, 转引自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9页。

②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晚清文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③ (美)霍塞著，越裔译:《出卖上海滩》，大地出版社1941年，第7-9页。

④ S. W. Williams, *Recollections of China prior to 1840*. JNCBRAS, Vol. VIII, P16.

⑤ (美)泰勒·丹涅特著，姚广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72页。

⑥ 见: Address, *Transactino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kong*, 1847, P7-8.

房子中，传教士到城内租房居住，被华人围攻和赶出城”^①。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被安置在城外一片泥泞地上用木杆架成的简陋房子里……他用尽力量想要在城里找到一所适宜的住处，都成徒劳”^②。整个反入城斗争是情绪支配理智，只是“盲目地反对英方提出的入城要求，而并没有客观的分析入城究竟会给民众带来何种利弊”^③。

在上海，外侨的生活环境较广州和福州要自由和宽松许多，他们可以到周围的乡村做短暂旅行。但开埠初期英国人就一再发现“中国人深深憎恨外国商人‘冒险家’和其他侵略分子，把他们称作‘鬼子’，连小孩子看见他们都大喊‘鬼子来了！’”^④。上海道台宫慕久采取隔离政策，“希望通过减少接触来避免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冲突，试图阻止外国人与中国居民混合居住，尽可能多的限制外国人的活动”；道台麟桂采取绥靖政策，辟设法租界供法国侨民居住，“其思想基础仍然是以夷制夷传统观念”^⑤。而普通上海人对西洋人的到来，感到新奇和费解，“在老百姓那里西洋人叫‘鬼子’，在士大夫那里，西洋人叫‘夷’、‘外夷’、‘西夷’，租界被称作‘夷场’”^⑥。“小孩子见了（洋人）就要哭，因为他们向来听人说这些都是极凶恶的洋鬼子”^⑦。

① Stent, G. C., *Chinese Lyrics*, JNCBRAS, VoL. VII, P93.

②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202.

③ 周振鹤：《〈六合丛谈〉综述》，《中华文史论丛》第6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9页。

④ 谭卓垣：《广州的定期刊物调查》，《岭南学报》4卷3期，第3页。

⑤ 梁元生著，陈同译：《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47页。

⑥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晚清文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⑦ （美）霍塞著，越裔译：《出卖上海滩》，大地出版社，1941年，第7—9页。

面对中国人的抵制，外侨除了依据不平等条约进行交涉外，就希望尽快了解和认识中国，而要实现这一目的，从文化入手当是必经之途。早期在华外侨主要是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三类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据卫三畏回忆，“林则徐时代，只有五人懂汉语，这五人中能够胜任翻译的只有罗伯聃（Mr. Robert Thom）、马礼逊（Mr. John R. Morrison, 1782 - 1834）和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①。1858年，美国公使列·卫廉致美国国务卿卡斯说“在旅华美商中没有一个能够写成或朗读一句中文的”^②。为了各自的目的，他需要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迫切地期望认识中国。为此，西方国家开始大力着手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关的机构。1847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文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成立，其创始人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 1737 - 1801）寄信给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 - 1890），提出了关于中国的33个问题，建议居住在香港和五个通商口岸的英国侨民需要关注这些问题。从这些问题看，当时西方对中国还知之甚少，他们急欲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风俗、贸易、思维习惯、历史观等方面的知识，文学成为了他们着手这一工作的有效途径。此外，“如何才能获得中国人在家中的日常生活知识？如何获得他们的对生活的想法、感情、心理世界、行为和那些难以名状却又对他们的生活有重要帮助的数以千计的点滴知识？”^③也一直是在华外国人所渴望了解的内容。

紧接着，来华外侨创办了报刊和其他文化机构。这方面还是传教

① S. W. Williams, *Recollections of China prior to 1840*, JNCBRAS, Vol. VIII, P16.

② (美) 泰勒·丹涅特著，姚广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72页。

③ Stent, G. C., *Chinese Lries*, JNCBRAS, Vol. VIII, P93.

士发挥着先锋作用。“他们相信一旦旧有的藩篱被打破后，将有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将基督教文明与信仰传播到中国人身上，并有责任和义务将基督教的仪式（生活方式）渗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中”^①。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创办《六合丛谈》，起初就是以传教为目的。

广东当时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种期刊：*Canton Register*（1827）、*Canton Miscollancy*（1831）、*The 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Chinese Repository*（1832）、《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等，大多旨在“透过报章杂志，中外人士可获得更清晰之了解，破除彼此间思想上之障碍”^②。《中国丛报》的创办人之一卫三畏回忆，创办该刊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关于中国的正确信息”^③。《六合丛谈》创刊时就讲到“溯自吾西人越七万余里航海东来，与中国敦和好之谊，已十有四年矣。吾国士民居于沪者，几历寒暑，日与中国士民游，近沪之地，渐能相捻。然通商设教，仅在五口，而士人足迹未至者，不知凡几。兼以语言各异，政化不同，安能使之尽明吾意哉？是以必须藉书籍以通其理，假文字以达其辞，裨远方之民与西士性情，不尽于隔阂，事理有可以观摩，而遐迩自能一致矣”^④。意思就是要借助这些平台，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研究，以与中国各地人民做思想上的沟通。一般来讲，英文杂志内容多为向西方介绍政治、文化、贸易情况，叙述中国风土人情，向本国报告有关消

①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202.

② 王萍：《西方算学之输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17辑，1966年，第137页。

③ S. W. Williams, *Recollections of China prior to 1840*, JNCBRAS, Vol. VIII, P17.

④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民国丛书》第二编49卷，上海书店，1990年，第75